

民国时期浙江省政府与 社会经济建设研究

陶士和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浙江省政府与 社会经济建设研究

陶士和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浙江省政府与社会经济建设研究 / 陶士和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5161 - 7571 - 2

I. ①民… II. ①陶… III. ①地方政府 - 行政管理 - 政治制度史 -
研究 - 浙江省 - 民国②区域经济 - 经济建设 - 研究 - 浙江省 - 民国
IV. ①D693. 62②F129.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254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大 乔
责任校对 邓雨婷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75
插 页 2
字 数 346 千字
定 价 8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我国学术界对于民国浙江史的研究，在十多年前还较为薄弱。但近期在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社科院等大学科研机构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出版了不少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成果，为继续深入这一史学领域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通史研究成果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当推浙江大学金普森教授和杭州师范大学袁成毅教授撰写的《浙江通史·民国卷（上、下）》，60万字的大作，全书共分18章，以“浙江军政府的建立与民国元年前后的政局”作为开篇，以“国民党在浙江的统治的结束”作为终篇，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对这近38年的历史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并附有详尽的“历史大事记”，可以说是民国浙江通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浙江大学汪林茂教授撰写的《辛亥革命在浙江》对民初浙江军政府有相当全面的阐述和评价。而拙作《浙江民国史研究通论》则采用个案研究（case study）的方法，从五个专题着手，对民国浙江的历史作了概要的梳理，也引起了学术界同仁的关注。

在民国浙江史人物和专题研究上，也有不少成果面世。在人物研究上，最有代表性的当推浙江大学杨树标教授的《蒋介石传（1887—1949）》，被视为学界“改革开放后第一部蒋介石人物传记”，尤其是他提出的“分阶段评价蒋介石”的观点有独到的一面。另外浙江社科院张学继教授的《陈其美与辛亥革命研究》，也较客观全面地评价了辛亥革命元勋之一陈其美的功过是非。在专题研究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是由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的几位教授完成的。如袁成毅教授的《民国浙江政局研究（1927—1949）》，陶水木教授的《浙商与中国

近代工业化》《江浙财团研究》，丁贤勇教授的《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以民国浙江为中心》《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朱俊瑞教授的《民国浙江乡镇组织变迁研究：以新县制为中心的分析》，潘国旗教授的《民国浙江财政研究》，徐鹤森教授的《民国浙江华侨华人研究》，马丁教授的《民国时期浙江对外贸易研究》，夏卫东博士的《民国时期浙江户政与人口调整》等。一个研究中心集聚一批学者，对民国时期一个省的历史做如此专题研究，在全国亦是不多见的。

但从总体上看，相比较而言，对民国时期浙江政府的政策实施与社会经济建设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少，即使从全国来看，这方面研究也较薄弱。据掌握的资料，暨南大学张晓辉教授所撰写的《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一书中的第六章“政府的实业政策和省营企业”，对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与社会经济建设的关系作了分析和阐述，但其他省份在这方面的研究确实还不多见。基于这一状况，从2005年开始，笔者带领研究生经过近10年的努力，专门对此问题作了资料收集和个案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从而形成此书，以求为民国浙江史的研究添砖加瓦。

二

在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我们之所以把关注点转向对政府和政策作用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使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建设方针和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此，以历史的眼光对这一专题进行研究必然是很有价值的。共和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尤其是1957年以后，由于实行的是不切实际的“左”的经济政策，导致经济发展失误，至“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时物资极其匮乏，农民的生活相当困难，而城市居民离开了票证几乎无法生存，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甚至买食盐、鸡蛋、白糖、煤油等都要凭票。买商品不仅要凭票，还经常要排长队，排队购买数量受限的食品或日用品在那时城市的大街小巷司空见惯。中国社会科学院雷颐先生在其撰写的《票证，计划经济失败的有力物证》中指出：“由粮食的‘统购统销’开始，各种票证越来越多，这其实是经济越来越困难的表现。”“而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

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5期）。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我们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同样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社会财富迅速增长，市场上商品相当丰富，13亿多中国人民开始过上了温饱的生活，所有的票证全部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成了政府以往经济政策重要的历史见证。

第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尤其是洋务运动的兴衰史，使我们认识到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经济的发展，政府的作为影响可能更大。正确的政策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国家政权的积极干预，为中国利用‘历史落伍者的特权’，缩短中西之间在生产力上的差距创造了有利条件。”（周积明：《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相反，错误的政策则会造成停滞甚至阻碍这种发展。

中国的近代工业是从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时开始的。当时清政府实行了“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经济政策。应该说这种政策对推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是起到积极作用的，尤其以“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冲破了封建顽固保守势力的阻挠，吸引了社会部分官僚、地主、商人、买办等人手中的资金投向近代企业，从而促进了中国最早的民间资本在洋务企业内部滋生并发育。正如研究中国近代煤矿业的日本学者长井伸浩所言“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制度的历史意义就在于能征集民间资本，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在制度上得到了保证”。苏联学者在《中国经济史》中也指出：“在官督商办企业的保护下，出现了中国私人资本，并且正是这种合办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为私人资本开拓了道路。”（《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9期，第381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社会上的民间资本要求独立发展自己的私人企业时，政府为这一模式设定的“不准另树一帜”“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等限制性规定，就越来越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发展的阻力，甚至当民间要求政府改革时，清政府也坚持不改初衷。难怪当时的开明人士王韬疾呼政府这一政策“只能为民祸，而不能为民福；能为民害，而不能为民利”，也难怪曾亲自参与洋务企业创办的郑观应亦发出“官督商办猛如虎，名为保商实剥

商”(《盛世危言·商务篇》)的感叹了。

但需要指出的是,几乎和中国在早期现代化道路上同时起步的日本,在及时调整政策方面却做得比较灵活。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创办近代企业时,最早实行的是“官营民助”政策,并由工部省负责(类似我国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显然,当时的日本明治政府也想利用国家力量来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不久后,这一政策的弊病同样逐渐显现出来了。然而,这时的日本明治政府与清政府态度完全不同,它断然放弃了原先带有封建保护性质的官营主义政策,改而实行“自由放任”的民营官助政策。明治十四年(1882年)政府新建立的农商务省明确向全国通告,要求从事工商业的人员脱离对官府的依赖以增强扩大“自勉力”。为此,日本政府还实行了三个重大措施:一是政府把原来官办的工厂(除部分军事工厂外),以低价出售给私人经营,包括当时比较有名的横须贺造船所、富冈制丝所。二是对民办的大型企业,不仅给予足够的银行贷款,而且给一些私人大公司(三菱共同运输公司、日本邮船公司等)以巨额补助金。三是优先对私人公司供应原料,价格上给予优惠。如为了扶助和发展棉纺织业,不惜牺牲棉农的利益,大幅降低棉花的收购价,以利于棉织品在市场上竞争。日本当时号称经济支柱的四大财团:三井、三菱、住友、安田集团,就是在这段时期打下基础的。可以认为,在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日本重要的新式工业企业,几乎没有不经过政府资助的。正因为如此,到1894年甲午战争时,中日两国的工业化基础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距,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不能说与政府的经济政策没有关系。这一点,到1895年后,尤其是到20世纪初清政府搞“新政”时才有所认识,转而开始实行扶助民间资本的政策,但实际上这时的中国已经错过了一段发展现代工业的大好时机。对这段历史,复旦大学的朱荫贵教授曾撰写过一本专著,对以上问题有相当深刻的分析和研究,给我们以很大启示。他在该书的“绪论”中指出:“在近代人类历史上,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特别是在后发国家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进程中,国家干预经济对其国家近代化的方向和成败常常发挥极大的影响,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第三,学术界的前辈和同人在这方面的积极研究和严谨探索,对我们起到引路的作用。他们的学术成果不仅给我们以启迪,也为我们对本专题

的研究和本著作的撰写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基础。

如老一辈的学者许涤新、吴承明先生所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第三卷）》，汪敬虞先生所著的《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总体考察和个案辨析》，黄逸峰、唐传泗、徐鼎新先生著的《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李新先生等著的《中华民国史》，张宪文先生等著的《中华民国史》，史全生先生所著的《中华民国经济史》，张仲礼先生所著的《上海近代史》等，虽然不是论述民国时期政府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的专门著作，但他们在著作中论述到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时，都或多或少涉及了这个问题，这就为我们从宏观上把握这个专题的研究打开了视野，提供了线索。

当然，除了以上带有通史和宏观方面的论著以外，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国内外史学界有不少学者已对这个问题引起关注，做了许多专门的研究，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成果，大大加深和丰富了这方面研究的内容，这就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帮助。因此，我们也想在本书的前言中对这些主要的成果做一简单的梳理，既表示我们对这些专家的感谢，同时也算是做一个“政府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学术回顾吧。这些著作中给我们留下印象比较深的主要有：

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该书对晚清至民国期间官、绅、商、学的社会角色、功能与相互关系作了比较系统的陈述与论析，尤其是该书的第五章“从商会看近代中国的官商关系”，从“官对商的保护与限制”和“商对官的回应与制衡”两个角度分析了政府（官）与经济（商）的关系。

杜恂诚著的《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该书可谓是中国史学界第一部明确提出政府与民间资本发展关系的著作，正如作者在此书引言中所述：“本书着重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线索及其同旧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有学者指出：“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领域一部富有创造性的著作。”书中提出许多启人深思的独到见解，如中国资本主义商业先于资本主义工业而产生，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形成中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作形式（作者概括为国家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必然性，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断和退潮，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历史评价，等等，都有不少和前人不尽相

同的新见（见汪敬虞先生为该书作的序）。

虞和平先生著的《商会和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该书从研究商会入手，对清末和民国时期国家的经济政策对中国早期现代工业和商业发展所起的作用作了较详尽的阐述，同时也对中国资产阶级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推进近代工业发展的需要，而积极参与了当时经济法规的制定和改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活动做了详尽的分析（可参见该书第四章“商会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了说明这个史实，该书还对清末民初的有关问题做了专门的论述。作者指出：“作为资产阶级政权象征的中华民国诞生了，仿照西方国家的新式政府机构设置起来了，一系列的法规制度制定出来了……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成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大声疾呼：‘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继而登上总统宝座的袁世凯也表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从中央政府的工商部到各省政府的实业厅纷纷制定《实业计划》，召开工商会议，研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见该书第 12 页）

朱英、石柏林先生著的《中国近代经济政策演变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在国内史学界，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近代中国（晚清至民国时期，1895—1949）经济政策演变及其作用的学术著作。该书不仅涉及时间较长（半个多世纪），而且阐述的经济政策相当全面，从工业政策到农业政策，从金融政策到货币政策，从公债政策到外贸政策，等等。此书之所以能完成，是与两位作者长期积累的学术研究分不开的。如作者之一的朱英先生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就着手探讨晚清时期清政府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并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一书，受到史学界同人的好评。而石柏林先生长期从事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研究，他撰写的《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一书，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和抗战期间以及战后的一些主要经济政策，都进行了较多的论述。他通过自己的研究，深切地认识到“在半殖民地特殊社会环境下诞生的中国私营民族工业，一般都比较幼稚，并且面临着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外国资本的倾轧。如果政府不从政策上在各个方面予以大力扶持和资助，中国的私营资本将很难与强大的外国资本竞争，也不可能获得迅速的发展。而私营民族工业能否充分发展，

又是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另一个关键，近代日本工业化的成功与中国工业化的受挫对比提出了明证。因此，政府对私营民族工业实施一系列政策，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与作用”。（见该书第6页）

吴景平主编的《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从金融业角度入手，通过大量的数据和量化研究的方法，对国民政府政策如何影响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如“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公债整理”“上海银行业与国民政府的废两改元”“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改组”等做了详尽的分析，使人们明白，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是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与“八一三事变”爆发期间，这十年是上海金融业的黄金时代。而“对于上海成为全国金融中心，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及其战略决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见姜义华先生为该书写的“序言”）

虞宝棠编著的《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从1912年“民国前期的经济政策”一直写到1949年“恶性通货膨胀与财政经济总崩溃”，对近半个世纪的民国政府经济政策及其影响与作用作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涉及了民国时期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重要事件。正如著者自己所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通过政府权力部门的力量，接收了北洋政府的官办企业，建立了‘四行二局’的金融体系，整顿财政，改革货币和税制，创办官营企业，制订各项经济计划等，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不断强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了战时统制经济政策，动员和集中了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支撑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是民国经济史的一个显著特点。”（见该书第4页）

徐建生著的《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1912—1937）》（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经过长期的努力，他收集和整理了大批资料，通过潜心研究，撰写了多篇专题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专著。他的观点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变化和兴衰起伏，固然受到自然、政治、社会和市场等多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有其本身固有的规律，但政府的经济政策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见该书“序”）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民国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作了一个贯通

性的探究，而不是将两者截然分开。“通过对政权性质、机构裁设、制度废立、人员去留、资产阶级参政的新旧替代、政策来源、政策思想和社会舆论发展轨迹，以及西方列强的关系等的分析，揭示两者之间既有变异又有沿袭的内在联系，进而探究近代经济政策的阶级性和整体共性。”（见该书第2页）

由于我们阅读资料所限，虽然努力对30多年来国内史学界的有关学术成果作了一个梳理，但肯定还有不少遗漏之处，尚待学界同人补正。

这里还需指出的是，和国内学界一样，国外史学界对近代中国政府和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也是相当关注和重视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美]小科布尔著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杨希孟、武莲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和[法]白吉尔著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小科布尔先生和白吉尔夫人对20世纪前叶（1910—1930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程和轨迹做了相当详尽的阐述，同时也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曲折发展原因和国家政府在其中的影响、作用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给后人以很大启示。例如白吉尔夫人在她的法文版“序言”中就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黄金时代指民国时期的最初十几年（1915—1927年，引者注）以失败而告终的命运，又说明如果没有国家的任何干预，亦无法建立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机制。”“中国的情况与所有其他较晚实行工业化的国家一样，国家在确定发展（包括资本主义发展）策略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只有国家才能建立各种制度机构，保障国内和平和公共秩序。与遭受外国多种形式统治的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相似，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需要通过国家政权的建立。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实业界的精英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他们也难以保障一个拥有数亿农业人口、疆域辽阔几乎遍及一个大陆的国家的完整、独立……因而也就是难以保障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见该书第7—9页）而这样的历史见地，即使到现在也有它的启迪作用：“直至今今天，中国资产阶级所获得的经验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可以这样说，它是中国目前正在实行的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之一。”（见该书第10页）

三

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

首先，注重专题研究，以深化对问题的分析论述。

我们注意到，不少学术界的前辈和同人，在研究中华民国这段历史时采用了专题研究的办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一改我们大学传统的通史教材体例，是一部以专题研究为主的研究性、学术性的新通史。以费正清教授自己所言：“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各卷学术地位较高的学者主导编辑总其成。”（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这样的研究方法确实给了我们以很大的启迪。

例如本书的“第一章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军政府的建立”和“第二章20世纪20年代浙江自治运动的兴起”就着重研究了民国浙江立法和自治的情况。1912年浙江军政府成立不久，就颁布了《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该《约法》规定人民拥有充分的法权和政治参与权，地方政府首长由人民公举产生，并要受到议会的监督和控制，议会对地方政府的各级首长的任命有同意权等。所以从民国初中国政治民主建设的角度看，浙江是很有特点的。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浙江于辛亥革命至民元年初，短短数月间，在民主政治之推行上，就其临时省约法之内涵而言，确有极为崇高之理想与惊人之进步，使其在各省中居于前导的地位”（李国祁：《辛亥革命后第二次革命期间闽浙两省之议会政治》，载《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19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49页）。另外，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全国联省自治运动中，浙江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它是北洋系当权的省域中唯一兴起大规模省宪自治运动的省份。又如本书的“第八章近代浙江实业家的经济活动及其特点（1887—1935）”和“第九章浙江实业教育的兴办和作用（1897—1922）”，就对经济及有关的职业教育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民国时期浙江实业家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基本特点，这就是创办或参与投资的企业类型较多，行业并非单一；拥有资本量大，财力比较雄厚，占据着经济上的很大

优势；企业涉及的地区从浙江延伸到全国各地。对此有论者评述：“浙人性机警，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其营业商业也，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故能与票号抗衡，在南中别树一帜。其营业区域，在长江南北，且有利用交通之便，浸而蔓延各地。其大本营在上海、汉口两处，而南京、镇江、芜湖、九江等处，亦在势力范围。”（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2页）

而在社会事业建设方面，本书的“第三章张静江与浙江经济建设”中专门列举了西湖博览会以示说明。西湖博览会是1929年张静江主浙时举办的，此博览会主要的特点：一是展会规模大。西湖博览会陈列场所由8馆、2所、3个特别处组成。8馆有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工业馆，2所是指特种陈列所和参考陈列所，3个特别处是铁路陈列处、交通部电信所陈列处和航空陈列处。这些也多以图表、模型等形式陈列展出。二是陈列产品丰富。为扩大展品，当时筹委会专门派员分别到河北、河南、山西、辽宁、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及远至南洋各地征集展品。三是把展馆场地和杭州自然地形有机结合，以扩大影响。此次博览会所以冠以西湖之名，主办者的初衷就是“欲使天下人移爱慕西湖之心以爱慕国产”，所以博览会的会址选在西湖风景区最佳地段里西湖四周，包括断桥、孤山、岳王庙、北山、宝石山麓与葛岭沿湖地区，面积约5平方公里。所以西湖博览会的举办是中国博览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实际意义不仅止于提倡国货一层，而且还具有发扬社会文化产业的多重意义。在组织方式上已接近世界大型博览会的水平，同时也有很强的地方特色”。（袁成毅：《浙江通史·民国卷（下）》，第98页）

其次，采用个案分析方法，从人物入手，研究政府、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人物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历来是中国治史的传统。早在司马迁写的《史记》中，就专列有《货殖列传》，即是专门阐述先秦商人的经济活动的。而国外的史学界也同样如此。如美国耶鲁大学名誉教授、与孔飞力、魏斐德并称“美国汉学三杰”的史景迁教授就十分重视对历史人物活动与社会经济变化的研究，他写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就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极尽历史想象，“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文汇报》2014年3月27日）。另外，他撰写的《王氏之死》也是采用历史个案的考察办法，从王氏这一人物入

手，分析了1668—1672年山东郯城的农民、田间佣工等的生活及当时社会的土地耕作、税收、遗产分配、妇女地位等社会经济现象（〔美〕史景迁：《王氏之死——大历史背景后的小人物命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在本书研究中涉及的人物主要有先后担任民国时期浙江省政府都督、主席的汤寿潜、张静江、黄绍竑、朱家骅、张难先、沈鸿烈等人。他们中有的人在浙任职时间较长，有的很短（一年左右），有的人在任上做事较多，有的则较少。学界对他们在浙江的活动，有的研究较多，如张静江、黄绍竑，有的研究较少，如朱家骅、张难先。但无论怎样，他们对民国时期浙江社会经济的建设都或多或少做过努力，我们后人于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对他们加以研究，应该是无可臧否的。但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正因为本书采用的是专题和个案的研究方法，再加上我们学识和能力所限，对问题的研究肯定是不全面的，正如有的论者所言：“作为一个从特定角度研究观察的结果，这种研究的成果也就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制的，因为这种研究的角度绝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排他性的。”（韦伯：《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页）

最后，尚祈各位专家和学术界同人，对本书在探讨论述中所出现的错误和疏漏之处予以批评指教，是所至盼。

陶士和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军政府的建立	(1)
一 浙江军政府的性质	(1)
二 浙江军政府实施的主要政策措施	(7)
三 浙江军政府在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	(11)
第二章 20 世纪 20 年代浙江自治运动的兴起	(15)
一 浙江省自治运动兴起的背景	(15)
二 浙江省自治运动的演变	(31)
三 浙江省自治运动的特点	(45)
四 浙江地方自治发展的制约因素	(55)
第三章 张静江与浙江经济建设	(59)
一 社会经济概况与张静江的治浙主张	(59)
二 改善基础设施	(63)
三 改良农业和发展林业	(76)
四 举办展览会	(83)
五 张静江主浙时期经济建设的特点与评价	(92)
第四章 张难先主政浙江与经济社会发展	(101)
一 浙江时局与张难先奉命主政	(101)
二 张难先主政与浙江财政紧缩	(108)
三 张难先主政与浙江经济建设	(120)
四 张难先主政与浙江社会事业	(130)
五 张难先主政浙江的政策特点及其影响	(139)

第五章 朱家骅与民国浙江的建设（1927—1930； 1936—1937）	（146）
一 地方自治建设	（146）
二 社会建设	（161）
三 地方财政整顿	（177）
四 朱家骅建设现代化浙江的特点	（185）
第六章 黄绍竑战时实行的经济政策	（189）
一 浙江战时经济面临的困境	（189）
二 加强战时工农业的生产管理	（199）
三 加强战时财政整顿	（217）
四 加强战时对敌经济斗争	（229）
五 黄绍竑战时经济举措的特点分析及评价	（235）
第七章 战后浙江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停滞	（242）
一 浙江民间资本复兴的原因	（242）
二 战后浙江民间资本的初步发展和短期复兴	（243）
三 浙江民间资本发展重入困境及其原因	（247）
四 浙江民间资本的全面衰败	（252）
第八章 近代浙江实业家的经济活动及其特点（1887—1935） ...	（254）
一 近代浙江实业家群体的形成	（254）
二 近代浙江实业家经济活动的经验和特点	（258）
第九章 浙江实业教育的兴办和作用（1897—1922）	（272）
一 浙江实业教育兴起的背景	（272）
二 近代浙江实业教育的发展状况	（278）
三 浙江实业教育对社会的推动作用	（297）
主要参考文献	（323）
后记	（331）

第一章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军政府的建立

1911年是浙江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浙江各地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群众运动似疾风暴雨。就在武昌起义后全国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激荡之下，浙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广大群众，于11月4日举行了武装起义，不到一日即占领了除湖滨旗营外的杭州全城，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在浙江的反动统治，取得了起义的胜利。省城杭州光复后不久，全省各地也立刻闻风响应，纷纷宣布独立或反正。到了11月7日，浙江正式成立了军政府。至此，一个新生的政权诞生了。浙江军政府基本是按同盟会的纲领建立起来的。成立后不久就颁布了一系列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公布了一些解民倒悬的具体措施，在力图建设一个资产阶级近代化的地方政权上做了很大努力。它的建立，在浙江历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一 浙江军政府的性质

一个政权的性质，首先取决于它是由哪一种政治力量所建立，以及这个政权建立后又为哪一种政治力量所掌握，换句话说，一个政权以哪些阶级为社会支柱，是决定这个政权性质的重要依据。辛亥时期的浙江军政府，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领导下，发动新军、贫苦民众、知识分子及资产阶级其他进步阶层共同奋斗，经过起义而建立起来的一个革命政权，浙江军政府的主要职能机构都督府和临时参议会基本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手中，即便是立宪派汤寿潜担任了军政府的都督，也不能改变浙江军政权的革命性质。